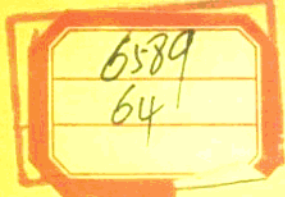


7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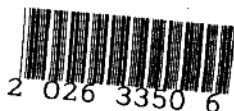


“四人帮篡”改马列主义政治 经济学原理、破坏社会 主义经济的罪行

(材料之一)



北京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政治经济学组



目 录

- 一、为了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1)
- 二、篡改资产阶级法权理论，扩大资产阶级法权…………… (9)
- 三、挥舞“唯生产力论”、“管、卡、压”等大棒，
破坏抓革命、促生产。…………… (12)
- 四、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 (23)
- 五、破坏工业学大庆…………… (27)
- 六、破坏农业学大寨…………… (32)
- 七、破坏对外贸易政策，大搞崇洋媚外、投降卖国…………… (40)
- 八、大搞特权，生活极端腐朽糜烂…………… (46)

一、为了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他们妄想拼凑出一个所谓“张春桥思想”，作为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理论”。这个所谓的“张春桥思想”，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思想。张春桥公然诬蔑毛泽东思想“过时了”，胡说什么：“我学了毛主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中国社会各阶级情况还是不甚了了”，还胡说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为我党制定的基本路线，没有解决“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变化”的问题，狂妄地叫嚷要由他张春桥写一本《中国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分析》，“作为今后制定政策的依据”。……张春桥那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文章，竟被吹嘘为“第一次明确地论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论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第一个明确地阐述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还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是丰富了列宁的思想”。……并且迫不及待地要出一本所谓象毛主席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那样的书，要“写序言，加按语”，要“站得高，口气大，有点哲理，居高临下”。甚至狗胆包天地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出得晚了，等到出来，高潮已经过去了，这次要抓得早，要写在高潮到来之前”。这些谬论就是他们所谓的“张春桥思想”的三个组成部分，居然被吹捧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第四个里程碑”，赤裸裸地暴露了“四人帮”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叛徒，是一伙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上海市革委会付主任王一平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上海已成为埋葬“四人帮”的汪洋大海》《人民日报》1976年12月25日

“四人帮”的黑军师张春桥，曾授意要上海搞所谓“现阶段阶级关系变化”的调查。他们亲信竟叫嚷要写一篇象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那样的文章，还狂妄地提出什么“张春桥思想”，“第四个里程碑”，“张春桥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等；他们还背着党中央，编写所谓《党史》，为“四人帮”树碑立传，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反党分子王洪文也迫不及待地要人把他在上棉十七厂呆过的一个办公室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还组织人去“参观”，搞所谓“传统教育”。他还授意炮制一本所谓《文化大革命大事记》，无耻地为自己树碑立传。

《横扫“四害”如卷席》，《人民日报》1976年11月24日

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了这些工厂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同志们可以回想一下，一个官僚资本或者民族资本的企业，怎样变成社会主义企业的呢？还不是我们派了一个军管代表或者公方代表到那里，按照党的路线和政策加以改造？历史上任何一种所有制的大变更，不论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还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都是先夺取政权，再运用政权的力量大规模地改变所有制，巩固和发展新的所有制。

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页

我们还必须看到，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问题，就是说，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

同上第7页

张春桥说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改朝换代”。

《今日上海已成为埋葬“四人帮”的汪洋大海》，《北京日报》1976年11月24日

江青说：“政治经济学有一条，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男的、女的还不都是女的生的？是嘛！男的很简单，只有一条精虫。

“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到了全世界消灭了吸血虫就好办了，男的不能靠体力强想怎样就怎样。男的要让位，女的来管理”。

侯雋：《江青在小靳庄的讲话》

一九七四年以来，江青这个不学无术的政治骗子，突然热心起中国古代历史来。她上窜下跳，东跑西颠，发“指示”，作“讲演”，无耻鼓吹：“氏族社会是女人当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将来管理国家的还是女的”，露骨地狂叫“女人也能当皇帝，到了共产主义也有女皇。”……她指使人写文章为吕后、武则天歌功颂德，把她们捧上了天。还命人替她做了许多模仿武则天时代宫廷服装的衣服，妄想有朝一日，穿起她朝思暮想的死人服装加冕登基。

卫民：《女皇梦及其破灭》，《人民日报》1976年11月17日

江青攻击毛主席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在未来是真理，具体的有历史局限”。

就在同一时期，即1975年3月29日江青却大肆吹捧反党分子张春桥的文章，说什么“我给你们带来了一篇文章，文章写

的提炼，内容深刻，要动脑筋学。”

“现在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性要擦亮眼睛，认识清楚，保持高度警惕”，“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

《天兵怒气冲霄汉》，《北京日报》

1976年11月29日

张春桥在军队的一次会上大讲反经验主义，甚至叫嚷要把所谓反经验主义“当作纲”，以后在三月二十一日又提出“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经验主义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绊脚石，是革命的大敌，大敌当前，有打倒它的必要”。

《戳穿“四人帮”大反经验主义的罪恶目的》《北京日报》1976年11月7日

1976年10月3日江青继续宣扬什么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胡说什么“教条主义是少数，经验主义是多数，因为没有文化。”

“我是来和你们一起学习文件，一起批邓的。”“跟邓小平跑的人很多，不是一个两个人。”“某某部是造谣公司的分公司”，“某某部是男尊女卑部”。

《狠揭猛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北京日报》1976年11月19日

我们倒是请同志们注意，现在刮的是另一种风，叫“资产”风，……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刮的“资产”风，对我

们的危害最大。受这种妖风的毒害，有的人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的人已经发展到把一切都当作商品，包括他们自己在内。他们加入共产党，为无产阶级办事，不过是为了抬高自己这个商品的等级，不过是为了向无产阶级卖高价。那种名曰共产党员，实际上是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人，表现了整个资产阶级处于腐朽垂死状态的特点。

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我们有些同志……对于无产阶级的某些胜利是高兴的，因为这可以给他带来某种利益，而只要这种利益到手，他就觉得可以安营扎寨，经营经营他的安乐窝了，什么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什么万里长征第一步，对不起，让别人去干吧，我已经到站了，该下车了。

同上

现在，资产阶级的土围子还很多，打掉一个还会长出一个，就是将来被消灭得只剩下一个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扫帚不到，也不会自己跑掉。

同上

张春桥授意炮制的一篇专论“辫子”的黑文，以批邓为名，实则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和一大批中央和地方领导干部。张春桥还嫌不够，他在“辫上总是有‘帅’”，“张勋就是以‘辫帅’而名垂史册”的地方批道：问题不在张勋，“在那个

被废除的制度和皇帝”。矛头指向毛主席。

伟康：《骂‘皇帝’与篡‘皇位’》，
《解放军报》1976年11月14日

他们公开叫嚷：“右倾翻案风的风源是国务院的务虚会”。
“四人帮”的一个亲信甚至影射攻击华国锋同志任第一副主席和总理是“纳吉上台”，胡说什么“大老爷在国家，二老爷在省，三老爷在市”，要整掉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领导同志。

沈正屏：《伪造“临终嘱咐”是要推翻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辽宁日报》1976年11月15日

他们帽子满天飞，棍子遍地打，动不动就给各级党委领导干部扣上“走资派”的帽子，把不同意他们那样干的新干部打成“投降派”，把坚决按照党中央、毛主席指示办事的广大干部和群众诬蔑为“文件派”、“右倾保守势力”。相反，他们把那些不劳动、不工作、拉山头、搞分裂，甚至大搞打、砸、抢的人看成是最革命的，而且要各级党委承认他们的“革命精神”，你不承认，他就说你“不转弯子”、“压制群众”，你要是承认了，他就伸手向你要党票，要官票。他们就是要搞得你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以便取而代之。

《中原大地风雷吼》，《人民日报》
1976年12月7日

“四人帮”攻击革命的老干部，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说老干部是“四大金刚”、“八大怪”，“他妈的资产阶

级民主派”，“老干部百分之八十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扬言“要动大手术”，“要用铁的手腕解决组织问题”，“让他们都回家抱娃娃去”，“应该抓起来，枪毙几个。可惜中国还没有这样的法律”，“现在还不到时候，到时候一个一个地给我下台”。

《痛打“落水狗”，猛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罪行》，《北京日报》1976年11月21日

“四人帮”攻击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领导干部，说什么“现在上头有四大金刚、八大怪，下面有大大小小的走资派”，“现在全国好多地方冰冻三尺，镐也刨不动，要用重炮轰”。

《天兵怒气冲霄汉》，《北京日报》1976年11月29日

今年二月，他们（指“四人帮”）派出黑爪牙窜来山西，进行反革命宣传和串连，对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干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部署，到处胡说什么山西是“死水一潭，冷冷清清，要促进一下”等黑话，竭力传播“打倒一切”的反动谬论，狂叫“老干部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由民主派到走资派”，“是客观规律”，“要从组织上大动手术。”他还厚颜无耻地要求省委放他的“报告”录音，并威胁说：“不放我的报告录音，将来是你们被动，是你们山西问题的爆发点。”真是嚣张狂妄到了极点。

《愤怒声讨“四人帮”的滔天罪行》，
《山西日报》1976年11月11日

王洪文在上海有一次对他的亲信叫嚷：什么要我主持中央工作，还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我有什么权，党、政、军大权都不在我手里。

岳维才：《叫嚷‘无权’，意在夺权》，
《解放日报》1976年11月14日

1976年9月29日下午江青窜到卫戍区某部“大功四连”，别有用心地说：“主席逝世了，都想捞一把”，“没有暴露的走资派还有没有？有！他们不甘罢休”。

《痛打落水狗，大揭大批“四人帮”极右路线》，《北京日报》1976年11月16日

江青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把生产关系说成是上层建筑。

《天兵怒气冲霄汉》，《北京日报》
1976年11月29日

王洪文说：“手表这种东西，可以增产”，“如果（手表多得很）放在马路上的话，就到了共产主义了。”

王风举：《王洪文的绝妙画像》，《北京日报》1976年12月24日

四人帮把自己当作救世主，把广大人民群众当成群氓，辱骂工人阶级“屁也不懂”，但对资产阶级则倍加恭顺。张春桥就曾经竭力鼓吹资本家可以入党。

石国纪：《彻底剥掉“四人帮”的假面》，《解放军报》1976年11月7日

二、篡改资产阶级法权理论，扩大资产阶级法权

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影响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思想根源。而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经济基础。

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 社会基础》，《红旗》杂志1975年第三期

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有些正在改革，改革的结果也并不巩固，旧思想、旧习惯势力还顽强地阻碍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生长。

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江青：我资产阶级法权挺多的，我虽然老是自己限制，还是有一些，有一些还必要，不然我就不能工作了。

中国民航首都机场大批判组：《“白骨精”在飞机上的丑恶表演》，《北京日报》1976年12月21日

“四人帮”不仅自己大肆营造别墅，修建安乐窝，请客送

礼，任意挥霍，侵吞国家的钱财，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还通过名目繁多的“补贴费”在职工中大搞“物质刺激”，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剥掉“四人帮”所谓“正确路线的代表”的画皮》，《山西日报》1976年11月19日

江青一伙，把自己打扮成“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英雄”，可是在我们团内却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大搞物质刺激，扩大等级制。此外还有什么“知名人士”的头衔，“高等舒适”的住宅，名目繁多的津贴，“江记宴会”的礼服等等，比之刘少奇、周扬一伙推行的文艺黑线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广大群众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扩大差别不是缩小差别。江青一伙知道后，即怀恨在心，反而变本加厉倒打一耙说什么：“这不是法权，这是革命的需要。”还恬不知耻地说：“这是按需分配吆。”

上海京剧团 唐岩群：《“四人帮”是破坏文艺革命的害人帮》，《解放日报》1976年12月5日

江青无耻吹捧自己，“我是重脑力劳动者”，“我就是没昼没夜地干，也不知道哪天是星期日，只是在批文件时看看几号”，“我连吃饭都要听录音”。

江青吹嘘自己已经“把劳动当做生活的第一需要”，“不劳动就难受”。

.....

江青污蔑工人“屁也不懂”，“重大理论问题都不懂”，

说话声音“难听”，说工人上班“想家里吃什么菜呀，家里弄个老母鸡呀，想买个什么好东西呀，多啦。”

《天兵怒气冲霄汉》，《北京日报》

1976年11月29日

江青胡说什么她“多次要求降薪”。

《从江青八次窜到清华看她要当女皇的狼子野心》，《北京日报》1976年12

月4日

江青吹嘘自己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如何自觉，胡说什么她“吃一根葱也要记帐”。

同上

北京第一服务局职工揭发“四人帮”大搞特殊化，过着资产阶级腐朽生活的罪行：江青对服务人员百般刁难，动不动就训人骂人，甚至有时还把服务人员关押起来。有一次，服务员给江青端去洗脸水，她嫌太热，就狠毒地抄起脸盆朝服务员身上泼去。她嫌服务员穿鞋走路带声，强迫服务员只穿着袜子走路。她理发时坐在小沙发上，边打扑克边理发，逼着理发员一条腿跪在地上给她理发。

江青大肆挥霍人民的钱财，过着花天酒地糜烂透顶的生活，竟恬不知耻地说：“我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就不算资产阶级法权。”

《“四人帮”是祸国殃民帮复辟倒退帮投降卖国帮》，《北京日报》1976年

11月15日

天津第一炼钢厂的工人齐升揭发：江青窜来我厂口口声声说是来看望工人，但是她根本看不起工人群众，不愿和工人接触。她假惺惺地只和一个工人握手，并让这个工人代表她同别人握手。

天津手表厂工人宋海峰揭发：江青在参观我厂时，胡说什么：“我愿意当工人、当农民，不费脑筋，整天劳动”。把工人、农民看成只会干活、不动脑筋的工具。

《天津工人阶级誓同“四人帮”斗争到底》，《天津日报》1976年11月2日

“四人帮”认为工人是只知道多生产，梦里也在“抢生活”的糊涂虫。

上海建筑机械制造厂工人理论小组文章，《解放日报》1976年11月8日

大野心家江青供认“见了工人就头痛”，胡说：“工人的本质就是脏。”

《打一场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罪行的人民战争》，《北京日报》1976年12月16日

三、挥舞“唯生产力论”、“管、卡、压”等大棒，破坏抓革命、促生产

他们制造了许多蛊惑人心的口号，什么“不为错误路线生产”，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

度”，大搞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在理论上、思想上肆意制造混乱。你要发展社会主义生产，他们说你搞唯生产力论；你加强企业管理，他们说你“管卡压”；你抓经济核算，他们说你“利润挂帅”；你关心群众生活，他们说你“收买人心”，“搞物质刺激”；你为革命钻研技术，他们说你“走白专道路”，等等。总之是扣不完的帽子，打不完的棍子，弄得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干也不对，不干也不对，什么也不敢干，什么都干不成。

《全国工交战线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形势大好》，《人民日报》1976年11月26日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为了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把他们罪恶的黑手伸到有的铁路单位去，疯狂破坏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他们大搞形而上学，动不动就用“唯生产力论”、“管、卡、压”等等帽子压制广大铁路职工抓革命促生产的积极性。他们猖狂反对毛主席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煽动停工、停产，胡说什么安全正点行车是“正点挂帅”，破坏铁路运输，破坏生产，破坏国民经济，影响人民生活，妄图达到他们搞垮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

《永做“抓革命，促生产”的火车头》，
《人民日报》1976年11月3日

“四人帮”反党集团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也把黑手伸向了铁路。他们公然对抗党中央对铁路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反对党的一元化领导，破坏铁路运输的集中统一指挥。他们把中央和

地方对立起来，在铁路和地方之间，铁路局和铁路分局之间制造矛盾。他们在铁路上另搞一套，对铁路运输的正常指挥，百般刁难，横加指责，把铁路运输中正常的、必要的车流调度、货流控制诬蔑为“管、卡、压”；他们大骂铁路工人学理论、促大干，多拉快跑，为社会主义多做贡献的革命行动是“唯生产力论”；诬蔑广大职工日夜奋战，确保铁路畅通是“通到资本主义去”，严重挫伤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打倒“四人帮” 多拉又快跑》，《人民日报》1976年11月11日。

资产阶级野心家江青明目张胆地造谣说，“毛主席就没有讲过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第一机械工业部大批判组：《“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大罪证》，《光明日报》1976年12月6日

张春桥叫嚷什么实现四个现代化“无非就是搞几千亿斤粮食、几万吨钢铁。”

同上

谁要是提一句按照毛主席提出的宏伟规划，实现“四个现代化”，“四人帮”就说你要搞“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为他人做嫁衣裳”，弄得人们无所适从，怎么干也不对。

《一切行动听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
坚决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斗争到底》
《天津日报》1976年11月7日一版

“四人帮”在革命和生产的关系到，还鼓吹什么“革命搞好了，生产就自然而然地上去了”的论调。……“四人帮”叫嚷生产可以“自然而然地上去”，就是要取消党的领导，把生产搞乱，使社会主义经济“自然而然地”陷入无政府状态，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任平：《一帮祸国殃民的害人虫》，
《人民日报》1976年11月14日

江青说：“这几年的经验，哪儿批林整风好，批林批孔好，那儿的工作就好，那儿的生产就好，那儿的战备就好。今年以来，哪儿的理论学习好，那儿的生产就翻几翻。你们今年就翻了，我知道。

《江青在接见大寨大队干部和社员的讲话》1975年9月12日

王洪文说：“这几年我们没有抓生产，生产照样上去了。”

周城黎：《扫除祸国殃民的害人虫》，
《解放日报》1976年12月6日

他大搞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搞乱了思想，搞乱了理论，严重地破坏了教育革命、文艺革命，破坏了工农业生产，胡说什么“一锹一镐不用动，路线解决了，生产就上去了”，妄图完全毁掉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

《打一场人民战争，深揭猛批“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的滔天罪行》，《辽宁日报》1976年11月29日